

金融抑制与劳动收入份额 关系研究

张建武 王 茜 林志帆 赵秋运

【摘 要】文章在厘清文献逻辑的基础上,考察了金融抑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抑制源自于赶超战略的配套制度残余与偏重国有部门的经济结构,其利率压制与信贷配给的特征形同于对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隐形补贴,这使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替代劳动进行生产,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形成压制。基于宏观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金融抑制指标与技术选择指数、国有经济比重显著正相关,且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便控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因素,该结论仍成立。这表明,为了扭转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不利格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摒除金融市场的扭曲性政策势在必行。

【关键词】发展战略 金融抑制 劳动收入份额

【作 者】张建武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 茜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林志帆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赵秋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左右的高增长,但在高速发展背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内外失衡的经济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根据Feenstra等(2013)的测算,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95年的54.65%下降至2009年的最低点41.89%,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23.35%,最近数年劳动收入份额虽有回升,但仍徘徊于45%左右。这一实证发现与Kaldor(1961)指出的“经济体的要素收入份额在长期内保持稳定”的经典论断是明显相悖的。

对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经济后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抑制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造成内需不足,使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与出口的拉动(李扬、殷剑锋,2007);二是由于劳动力要素的分布相对于资本要素天然地更为均匀,劳动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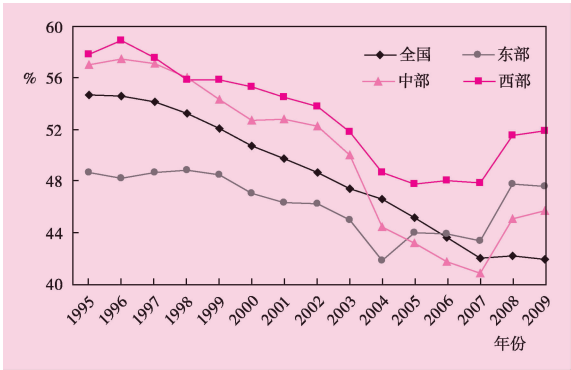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整体与各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

注:整体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来自 Feenstra 等,2013;分区域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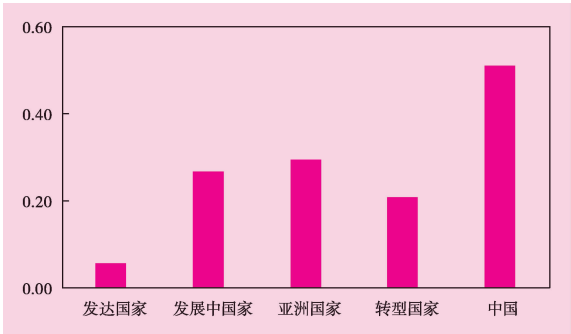


图2 2005年全球金融抑制状况对比

资料来源:Abiad 等,2010。

份额的下降意味着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下降,这既不利于劳动者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又引致贫富差距扩大,使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演变为规模性收入分配不均^①(李稻葵等,2009),激化劳资冲突与矛盾,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Daudey 等,2007)。

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中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手段对金融部门的发展进行管制与干预。例如,规定存贷款利率上限、限制信贷规模、定向分配低息贷款、资本项目管制等(McKinnon,1973,1993;Shaw,1973; Bai 等,1999)。其最直接的表现是利率被压抑在较低水平。根据 Abiad 等(2010)的测算结果,1991~2005 年,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在 91 个样本国中高居第五位,仅次于埃塞俄比亚、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与越南。如图 2 所示,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金融抑制程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的

平均水平,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及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

那么,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中国严重的金融抑制究竟源自何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长期共存的金融抑制和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这两大经济现象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如果联系成立,其相互作用机制是什么?基于发展战略与金融抑制的视角,我们又能为扭转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不利格局提供什么样的政策建议?

既有文献针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解释主要集中于 3 个角度:产业结构调整、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其一,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从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与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固有差距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因。其二,技术进步通过调整要素的生产效率与需求结构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黄先海和徐圣(2009)、张莉等(2012)、陈宇峰等

① 功能性收入分配主要考察国民收入在土地、资本与劳动等各要素之间的分配;而规模性收入分配则主要考察不同个体间的收入与贫富差距的大小。

(2013)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近年来倾向于使用资本代替劳动,这一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优势地位被强化,最终致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其三,在全球化趋势方面,既有文献发现,贸易开放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通过影响资本与劳动在收入分配上的“议价能力”对要素收入份额产生影响(赵秋运等,2012;赵秋运、张建武,2013)。此外,还有学者从所有制结构(周明海等,2010)、需求结构(孙文杰,2012)、劳动力市场制度(魏下海等,2013)等方面展开讨论。

然而,以上文献均没有考虑中国长期显著存在的金融抑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目前,中国是少数曾全盘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之一,赶超式的发展战略与政府管制曾大行其道,尽管自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1992年之后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却使赶超式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与大量的国有企业得以保留,这可能是当今中国金融抑制程度仍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缘由。本文试图利用宏观数据从金融抑制的角度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提供新的解释,并且补充金融抑制对收入分配研究中所欠缺的功能性收入分配部分。本文提出的命题是,金融抑制源自于赶超战略的配套制度残余与偏重国有部门的经济结构,其典型表现是政府要求银行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率将信贷资金配给到政府所合意行业中的企业,这形同于对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隐形补贴,使企业倾向于以资本替代劳动进行生产,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形成压制。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描述

(一) 实证模型

首先,我们检验金融抑制内生于赶超战略的制度残余与偏重国有部门的经济结构。具体模型为:

$$FinRep_{p,t} = \beta_1 \times TCI_{p,t} + \beta_2 \times SOE_{p,t} + \delta X + \mu_p + \omega_t + \varepsilon_{p,t} \quad (1)$$

其中, $FinRep$ 为金融抑制指标, TCI 为计算得到的技术选择指数, SOE 为国有经济比重,两者的估计系数预期均为正; p 与 t 分别表示省与年度, μ_p 与 ω_t 分别为省份与年度固定效应, $\varepsilon_{p,t}$ 为随机扰动项。

X 为一组与金融抑制有关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人均GDP。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市场化水平更高,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少,金融抑制水平应当较低,预期符号为负。(2)贸易开放度。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经济更为开放外向的地区政府干预相对较少,也有较多的外资流入,金融抑制水平应当较低,预期符号为负。(3)人口抚养比。在社会抚养比较高的情况下,经济体的储蓄会下降,资本要素供给不足,这将使金融抑制的经济社会成本上升,从而“倒逼”金融抑制政策放松,其预期符号同样为负。为得到无偏一致的估计结果,我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进行充分的控制。

进一步考察金融抑制指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模型为:

$$LS_{p,t} = \beta_1 \times FinRep_{p,t} + \gamma Z + \mu_p + \omega_t + \varepsilon_{p,t} \quad (2)$$

其中, LS 为劳动收入份额,核心解释变量 $FinRep$ 估计系数预期为负。对于控制变量 Z

包括:(1)人均 GDP 对数值的一次项与二次项。反映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较第一与第三产业相对较低,因此在持续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会有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总体呈现 U 形的变动(李稻葵等,2009)。我们预期二次项系数为正,一次项系数为负。(2)资本产出比。用于控制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根据 Bentolina 等(2003)的讨论,资本产出比的回归系数如果显著为正,表示经济体的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 1,显著为负则意味着替代弹性大于 1,不显著则意味着替代弹性接近于 1。(3)贸易开放度。如前所述,学者们在对经济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进行研究时,普遍得到国际贸易压制劳动收入份额的结论,我们预期其符号为负。(4)政府支出比重。Diwan(2001)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可能与财政收支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有关,其符号预期为正。

最终,我们对前述的经济机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提出的经济机理是赶超战略的配套制度残余与偏重国有部门的经济结构引发金融抑制,而金融抑制进一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其中的隐义是赶超战略与国有经济比重本身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应当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金融抑制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更为直接的原因。因此,运用 Baron 等(1986)设计的中介效应检验,考虑以下两个实证模型:

$$LS_{p,t} = \beta_1 \times TCI_{p,t} + \beta_2 \times SOE_{p,t} + \gamma Z + \mu_p + \omega_t + \varepsilon_{p,t} \quad (3)$$

$$LS_{p,t} = \beta_1 \times TCI_{p,t} + \beta_2 \times SOE_{p,t} + \beta_3 \times FinRep_{p,t} + \gamma Z + \mu_p + \omega_t + \varepsilon_{p,t} \quad (4)$$

其中,式(3)考察技术选择指数与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直接影响,式(4)则在式(3)的基础上加入金融抑制指标。如果前述的经济机理成立,即金融抑制是赶超式发展战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我们应当可以观察到:在式(3)中,技术选择指数与国有经济比重的估计系数 β_1 与 β_2 均显著为负;在式(4)中,加入金融抑制指标之后,除了其系数 β_3 显著为负之外,技术选择指数与国有经济比重的系数应当失去统计显著性。

(二) 数据及指标

1. 金融抑制

如前所述,金融抑制政策及其体现可能包含许多方面的内容,如何对其进行标准化的衡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使用金融发展程度、金融机构贷款存款比、金融业竞争程度、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 4 个指标描述金融抑制程度。其中,前两者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后两者数据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1)。为了方便分析、避免概念混淆,我们将各项指标进行标准正态变换,再进行加总,最后进行反向变换,使较高的数值表征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程度。

2. 发展战略

我们使用 Lin 等(2004)构造的技术选择指数对发展战略的“赶超程度”进行衡量,其核心思想是:一国的最优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而赶超战略是对最优状况的扭曲,因此实际中可观测的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可以作为发展战略的

一个代理变量。技术选择指数可写为：

$$TCI=\frac{Y_m/L_m}{Y/L} \tag{5}$$

式(5)中, Y_m 与 L_m 分别表示工业部门的产出与劳动力数量, Y 与 L 则表示整体经济的产出与劳动力数量。 TCI 为工业部门与整体经济的产出劳动比的比值。如果政府采取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一方面使工业部门技术选择偏向资本密集,其要素需求结构中使用较少的劳动力,产出劳动比较高,分子较大,技术选择指数较高;另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也使工业部门的产值占比上升,同样导致技术选择指数偏高。

3. 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即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度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重要指标。但在现实中,统计资料的限制(数据质量不高、数据缺失、时间跨度较短)和统计口径的不断变化使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存在诸多困难与争议。出于对基础指标数据获取的便利性与可信度的考虑,避免对劳动者报酬的范畴进行过多的主观调整,本文采用陈宇峰等(2013)定义的“要素法”计算劳动收入份额^①。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②。综合各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信度,最终得到30个省份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后续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

(一) 发展战略与金融抑制

表2是以金融抑制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具体而言,该表所呈现的是前述模型1的估计结果,验证金融抑制是否内生于赶超战略的制度残余与偏重国有部门的经济结构。回归结果表明,表征发展战略赶超程度的技术选择指数越高、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相应的金融抑制程度便越严重。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n=390)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金融抑制	-0.045	0.433	-1.658	0.903
技术选择指数	2.322	0.792	1.067	4.879
国有经济比重	0.472	0.138	0.138	0.793
劳动收入份额	0.485	0.072	0.314	0.662
人均 GDP 对数值	9.334	0.668	7.776	11.048
人口抚养比	0.411	0.075	0.247	0.603
贸易开放度	0.304	0.363	0.040	1.668
资本产出比	2.068	0.886	0.228	4.786
政府支出比重	0.150	0.063	0.053	0.450

① 劳动收入份额的另一种常见计算方法为使用劳动者报酬直接除以地方生产总值得到(即“GDP法”),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除了数值有所差异,时序变动趋势与各省份的截面差异非常相似。本文在后续实证检验中亦使用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囿于篇幅限制未予报告。

② 由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截止时间为2009年。因此,我们只能从中获取1997~2009年的金融业竞争程度、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两项变量。

表 2 发展战略与金融抑制 (n=390)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技术选择指数	0.485*** (8.03)	—	0.410*** (7.50)	0.430*** (8.52)
国有经济比重	—	3.470*** (6.12)	2.982*** (5.09)	2.596*** (5.85)
人均 GDP 对数值	—	—	—	-0.451*** (-4.00)
贸易开放度	—	—	—	-0.659*** (-4.60)
人口抚养比	—	—	—	-0.564 (-1.66)

注: (1) 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 (2) 系数标准误使用 Driscoll 等 (1998) 稳健估计法得到; (3)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在多种模型设定中,二者相关系数均为正,且数值稳定,并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体现出良好的稳健性。这证实了我们的猜想:在发展战略

的赶超倾向更高、经济结构上更为偏重国有部门的地区,政府为了支持重工业企业与国有经济的发展,往往采取一系列的行政干预措施对利率进行管制,并将稀缺的金融资源优先划拨至符合政策导向的行业与国有企业,从而形成严重的金融抑制。中国的金融抑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内生于赶超战略的制度残余与偏重国有部门的经济结构。

人口抚养比的符号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口老龄化使资本要素的供给减少,推高了金融抑制政策的经济成本,使政策层面的“最优”金融抑制水平趋于下降。从现实中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贸易开放的深入和人口老龄化压力的逐年加剧,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与管制趋于下降,金融抑制指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这与本文的回归结果一致。

(二) 金融抑制与劳动收入份额

表 3 给出了金融抑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回归结果,并进一步将总体样本区分为东、中、西部^①3 个子样本进行估计,以探索本文提出的经济机理在不同区域的适用性与解释力是否有所不同。

表 3 金融抑制与劳动收入份额 (n=390)

变 量	整体回归		分区域回归		
	模型 5	模型 6	东部	中部	西部
金融抑制指标	-0.039*** (-5.50)	-0.034*** (-5.31)	-0.005 (-0.65)	-0.063*** (-3.75)	-0.040*** (-3.54)
人均 GDP 对数值	—	-0.493*** (-6.13)	-0.582*** (-4.17)	0.316 (0.66)	-0.791*** (-4.69)
人均 GDP 对数值平方	—	0.018*** (5.35)	0.018*** (3.47)	-0.010 (-0.44)	0.035*** (3.53)
资本产出比	—	0.002 (0.37)	0.086*** (5.63)	-0.050* (-2.15)	0.009 (1.14)
贸易开放度	—	-0.019 (-1.36)	-0.036** (-2.66)	-0.283 (-0.84)	-0.175* (-2.21)
政府支出比重	—	0.228* (1.98)	0.810*** (4.20)	1.204** (3.09)	-0.086 (-0.94)

注:同表 2。

① 东部包括 12 个省份: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包括 9 个省份: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 9 个省份: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整体回归结果显示,在单变量设定与完整模型的设定中,金融抑制指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39与-0.034,两者非常接近,且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证明金融抑制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金融抑制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利率被长期压抑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就意味着资本的相对价格更为低廉。企业为节约要素投入成本,显然更倾向于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在生产中提高资本投入的比重。而劳动力生产效率也越来越依赖于机器设备及嵌套于资本品之中的技术进步,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资本投入比重的加大和劳动需求下降都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

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抑制对于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这可能与东部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较少的政府干预与较低的金融抑制程度有关,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同时,这还意味着金融抑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可能还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对于中部与西部而言,金融抑制则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两者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如表4所示,根据陈斌开、林毅夫(2013)的讨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中承接了大量重化工业企业的迁移,从而形成赶超程度更高的产业结构^①,同时具有较高的金融抑制水平。从数据层面来看,西部地区的金融抑制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轻。

表 4 各区域金融抑制情况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东部	-0.127	0.512	-1.658	0.903
中部	0.077	0.292	-0.788	0.864
西部	0.083	0.575	-1.123	1.535

观察各控制变量可以发现:(1)人均GDP对数值的一次项基本为负,二次项为正,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U形关系成立;但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仍处于下降通道,其原因很可能是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尚未到达U形曲线的拐点,这与李稻葵等(2009)的研究结论相符;(2)从整体来看,资本产出比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中国在全局范围内资本与劳动要素间的替代弹性接近于1;但各区域情况有所不同——东部地区的替代弹性小于1,中部地区大于1,而西部地区则接近于1;(3)贸易开放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本为负,这印证了现有文献的结论;(4)政府支出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表明财政收支的再分配效应的确有助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状况。

(三) 稳健性检验

表5给出了式(3)和式(4)的估计结果。从表5中的模型7~9可以发现,技术选择指数与国有经济比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证明赶超战略的制度残余与偏重国有部门的经济结构本身能够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从模型10~12的估计结果发现金融抑制指

^① 陈斌开、林毅夫(2013)使用“与受威胁边境最小距离”作为技术选择指数的工具变量对其内生性进行修正,本文也做了同样的尝试,发现核心结论并未改变,囿于篇幅限制未给出。

表 5 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检验框架(n=390)

变 量	仅发展战略与国有经济比重			加入金融抑制指标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金融抑制指标	—	—	—	-0.033*** (-6.17)	-0.031*** (-4.67)	-0.031*** (-5.27)
技术选择指数	-0.022*** (-3.06)	—	-0.016** (-2.46)	-0.001 (-0.10)	—	-0.001 (-0.15)
国有经济比重	—	-0.156** (-2.42)	-0.120** (-2.13)	—	-0.064 (-0.93)	-0.065 (-0.96)
人均 GDP 对数值	-0.692*** (-4.94)	-0.457*** (-6.00)	-0.570*** (-6.58)	-0.498*** (-5.24)	-0.451*** (-7.97)	-0.445*** (-6.97)
人均 GDP 对数值平方	0.029*** (4.46)	0.016*** (5.44)	0.023*** (5.47)	0.018*** (3.91)	0.016*** (6.71)	0.016*** (4.53)
资本产出比	0.008 (0.92)	0.005 (0.52)	0.005 (0.66)	0.002 (0.38)	0.001 (0.19)	0.001 (0.18)
贸易开放度	-0.008 (-0.55)	-0.001 (-0.08)	-0.009 (-0.63)	-0.019 (-1.34)	-0.019 (-1.39)	-0.019 (-1.36)
政府支出比重	0.298* (1.86)	0.120 (1.27)	0.226 (1.69)	0.232 (1.59)	0.203** (2.07)	0.197 (1.55)
R ²	0.532	0.533	0.538	0.555	0.557	0.557

注:同表 2。

标在多种设定下系数稳定于 -0.030 左右,且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与表 3 的估计结果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技术选择指数与国有经济比重均失去了统计显著性,相对于模型 7~9 而言,无论是系数估计值还是 t 统计量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此外,观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并与表 3 中模型 6 回归结果比较,技术选择指数与国有经济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解释力(R²≈0.53)低于使用金融抑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解释力(R²≈0.55),而在使用金融抑制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加入技术选择指数与国有经济比重对模型 R² 的影响微弱。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考虑了金融抑制因素之后,技术选择指数与国有经济比重失去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解释力。这说明相对于赶超战略的制度残余与偏重国有部门的经济结构而言,金融抑制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更为直接的原因。那么,国家对金融系统的高度垄断和控制,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金融倾斜,民营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难以获得金融支持,其资本的积累更加倾向于自我原始积累,即依靠对劳动的原始积累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结果发现,金融抑制源自于赶超战略的配套制度残余与偏重国有部门的经济结

构,它导致要素市场价格信号失灵、信贷资金流向形成明显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其利率压制与信贷配给的典型特征实际上形同于对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隐形补贴,这使得企业倾向于以资本替代劳动进行生产,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形成压制。

本文使用 1997~2009 年的宏观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金融抑制指标与技术选择指数、国有经济比重显著正相关,且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便控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因素,该结论仍稳健成立。这说明,赶超战略与金融抑制不仅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欲速则不达”的,其经济后果还表现为对要素功能性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

首先,中国的金融抑制政策起源于赶超式发展战略的推行。为了实现政策目标——建立偏向于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政府采取行政干预手段将稀缺的资本要素优先配置到重工业部门企业与国有企业以支持其发展。虽然经过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中国已放弃赶超式发展战略与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渐进式改革固有的不彻底性使赶超战略的残留制度盘亘至今,重工业企业和国有企业仍占据资源和政策上的优势。因此,消除金融抑制政策不能只是单纯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而要求政府从政策导向的根源上放弃经济赶超,选择与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产业结构,鼓励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适当放宽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次,针对中国现阶段资本相对短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特征,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是较为符合该阶段特征的最优经济结构。具体的措施应当是改变国有大银行在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局面,推动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形成与最优经济结构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应减少对中小银行的直接干预或过度干预,让中小银行的金融资源交由市场来配置;从中小银行的角度看,作为盈利性的市场经济主体,积极创新,开拓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中小企业灵活的融资需求。鼓励和推动中小银行的发展,为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平台,是改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
2. 陈斌开、林毅夫(2013):《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3. 陈宇峰等(2013):《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经济研究》,第6期。
4. 樊纲等(2011):《中国市场化指数》,经济科学出版社。
5. 黄先海、徐圣(2009):《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经济研究》,第7期。
6. 李稻葵等(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7. 李扬、殷剑峰(2007):《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

- 第6期。
8. 罗长远、张军(2009):《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9. 孙文杰(2012):《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经济研究》,第5期。
 10. 魏下海等(2013):《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8期。
 11. 张莉等(2012):《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第2期。
 12. 赵秋运、张建武(201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新解——基于国际贸易和最低工资的视角》,《金融研究》,第12期。
 13. 赵秋运等(2012):《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14. 周明海等(2010):《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管理世界》,第10期。
 15. Abiad, A., Detragiache, E., & Tresselt, T. (2010), A New Database of Financial Reforms. IMF Staff Papers, 57 (2), 281-302.
 16. Bai, C.E., Li, D.D., Qian, Y., et al. (1999), Anonymous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How Does China's Reform Limit Government Predation without Reducing Its Revenue? CEPR Discussion Papers.
 17. Baron, R.M., & Kenny, D.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6), 1173.
 18. Bentolila, S., & Saint-Paul, G. (2003), Explaining Movements in the Labor Share. Contributions in Macroeconomics. 3(1).
 19. Daudey, E., & García-Peñalosa, C. (2007), The Personal and the Factor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3(5), 812-829.
 20. Diwan I. (2001), Debt as Sweat: Labor,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Mimeo, The World Bank.
 21. Feenstra, R.C., Inklaar, R., & Timmer, M. (2013),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No. w1925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2. Kaldor, N. (1961),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acmillan. pp. 177-222.
 23. Lin, J.Y., & Liu, M. (2004), Development Strategy,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s of Development in Lagging Regions.
 24. McKinnon, R.I.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5. McKinnon, R.I. (1993),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JHU Press.
 26. Shaw, E.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朱 犁)